

“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杨玉珍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及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了解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的现状,研究发现这一建设工程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提高了公共参与、激活了公益事业、繁荣了公共文化、净化了乡村风气等。基于传统乡村公共性逐渐消解的现状,从行政举措、利益效应以及村落记忆3个方面分析乡村公共性在“幸福村落”创建中得以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根源在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实现对接,再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

关键词 “幸福村落”;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公共参与;公共文化;村落记忆;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C 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4)01-0023-07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有三层意思:公开性^[1]、现实性^{[2]88}以及共通性^{[2]83}。尤根·哈贝马斯则指出公共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指向,其终极目标是公共共识的形成,认为公共性的形成有三部曲:独立的公共空间—公共批判—形成公共共识^[3]。郭湛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最重要的属性,“社会是一种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其成员心存公共精神和公共规则。因为一个社会中的公共精神越充分,公共规则越有效,其环境和氛围就越和谐、越美好,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4]。基于学者以往的研究,本文所涉及的“公共性”则侧重于其社会属性,从公共精神和公共规则两方面进行定义:公共精神即责任感,负责任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积极投入公共生活的热情,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自己更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斗争的情怀;公共规则即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规范与约束作用的规则。

公共性概念可进一步操作化为为我性、为他性、集体性以及规约性等4个维度。为我性与为他性是密切相连、互不分离的,如果此二者分离则谈不上公共性。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强调自我的实现与满足,但同时人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对他人有着依赖。因此,人必须在为己的同时还要为他,要主动自愿地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负责任。公共性并

不排斥私人性,但是要在对他人负责的前提下实现自我的满足。集体性即集体主义。规约性即对人们的行为发挥规范、约束的作用。因此,公共性也可理解为利他主义前提下的个人主义及集体主义。

传统的乡村公共性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基础建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跌宕起伏,传统的乡村公共性赖以生产和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因而逐步趋于消解。此外,阎云翔指出:国家的一系列举措促使私人生活发生转变,他强调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摧毁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瓦解村庄公共生活的关键因素。他进一步指出,随着传统公共性的消解,一股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潮弥漫乡村社会,使村庄治理出现若干困境,严重阻碍了村庄的良好及有序发展^[5]。此后,中国的学者们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吴理财认为当下村庄的公共精神流失使得村庄公益事业日渐萎缩,具体表征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乡村公共生活退化,个人私欲无限膨胀,自我中心主义泛滥,互助精神消解,公共意识衰落等;另一方面是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即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退隐到私下场合,对人们行为的规约作用越发苍白无效,这意味着传统的公共道德力量趋向式微^[6]。张胜前也指出,在乡村公共性日渐瓦解的村庄,公共舆

收稿日期:2013-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0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08ASH01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430)。

作者简介:杨玉珍(1988-)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E-mail: yuzhen19880705@126.com

论失去了原有的震慑力,道德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譬如:年轻人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贪污成风,甚至与乡村“拳头势力”联合在一起^[7]。赵晓峰则论述了村落的公共性与个体农民的政治性之间的唇亡齿寒关系,村落公共性的丧失带来了农民政治性的快速流失,进而导致农村基层治理的怪圈^[8]。学者们以往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乡村公共性日益消解的现状,本文拟通过对湖北秭归“幸福村落”的实地考察,运用集体座谈会和深度个人访谈的研究方法,就“幸福村落”创建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能性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实现乡村公共再生产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幸福村落”创建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何以可能

笔者跟随课题组于2013年3月下旬前往湖北秭归对创建“幸福村落”的11个试点村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11个村落和24个农户住所,与相关领导进行了座谈,对秭归创建“幸福村落”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幸福村落”的创建为破解当前乡村公共性趋于消解的困境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创建工程之所以被提上日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模式出现了瓶颈。“杨林桥模式”的农村社区建设虽取得巨大成效,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新的难题:农村社区规模过大,社会服务及管理难以精致化,成效日渐不明显^[9]。而“幸福村落”建设是完善农村社区建设成果,深化与拓展农村社区建设功能,深度推进村民自治的具体措施,是强化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载体,它符合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符合当地实际,更符合群众意愿。首先,村落的规模比农村社区更小,更具有凝聚力,更有利于基础建设和社会管理。它是以村为单位,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有利发展、群众自愿、便于组织、尊重习惯、规模适度”的原则科学组建的,其规模依自然山势地形而形成。其次,一个村落有着相同的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和亲情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此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村落模式在利益共享上能够达成一致,实现共同受益。政府只要稍加引导即可实现更为符合当地实情的乡村治

理。“幸福村落”创建过程中实现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具体分析如下。

1. 提高公共参与度

“幸福村落”创建试点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衷心拥护,其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村民负责任地推选心目中的最佳领导者,即“一长八员”,积极参加村落理事会的会议,自觉服从“一长八员”的领导与号召,而“一长八员”也积极热心于公益事业。比如,J村第一村落的王某因为人正派、处事公道而被推选为村落理事长,他带领全村开展环境治理,实现全村总动员,采取农户自己清理与村、社区组织专班集中攻坚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公路沿线堆积物、农户房前屋后水沟杂物和杂草等,大大改善村落环境;第四村落的茶叶加工及销售大户杜某当选为村落理事长后,积极指导和组织该村落农户对20.10 hm²茶园进行防虫治病及秋季管理。

2. 激活公益事业

“幸福村落”创建之前,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商讨决定后才得以通过。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诸如村民代表人数少、受益户数少以及投资难度大等因素,部分偏远的自然村组的公益事业难以通过。尤其是涉及村民利益时,村庄公益事业尤其难做,如道路维修,由于占地及补偿价格难达成一致而影响工程进度。“幸福村落”创建开展之后,通过村落理事长组织,“一长八员”带动,村民自己协商,很多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比如:J村群众在各村落理事长的带领下硬化机耕道超过3 000 m;T村村民在村落的组织下投工600多人,维修村落公路24 km,建沼气池30口,饮水池20口,架设水管3 000 m;W村的各村落在修建果园公路的过程中通过占地互调、资金自筹等方式仅用2天就完成了土地调整,大大缩短了果园路的建设时间,使得0.24 hm²柑橘园、36个家庭受益;J村第一村落剪刀岩有11户村民至今不通公路,而公路修建工程启动后,村民改变了以往的“等、靠、要”和畏难心态,积极主动自筹资金、投工进行公路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群众出行环境。

3. 繁荣公共文化

各村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及民间文化活动,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宣传队,扩大了农村政策的宣传面,弘扬地域和村落文化,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消除封建迷信、法轮功及各种邪教组织在农村的影响,使农民群众享受高尚、健康的先进文

化,促进了乡村和谐。如C村由各村落宣传员组建了一支的文化宣传工作队,专门负责开展村民文化娱乐活动,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村庄的公共事务动向以及身边的好人好事。群众反响非常好,均反映“自己闲在家容易影响邻里之间的感情,大家伙都出来蹦跳可以促进感情交流”。

4. 净化乡村风气

村民自行化解矛盾,在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做到了“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村落”,家庭暴力、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等难题得到解决。据村民王某回忆,过去村里的邻里纠纷、家庭暴力时有发生。“到外面打工回来的男人,似乎都有暴力倾向,喜欢拿自个儿的媳妇出气……邻居之间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打起来,几年前村里还发生一件命案呢,侄子向姑姑索要钱财遭拒绝就痛下杀手”。如今的乡村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净化,据某村落王理事长所说,自从实施“幸福村落”创建工作之后,村里的治安以及风气都变好了,虽然邻里间仍偶有小摩擦,但是经过劝解很快就能握手言和,在调解员掀起的舆论风暴下家庭暴力也得到遏制,干群间的矛盾也在村落理事长的努力下得到缓和。

显而易见,上述4个方面展现了乡村公共性正在经历再生产的过程,也表明了“幸福村落”建设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可能性。小村落聚起大决心,小平台体现大服务,小人物发挥大作用,显然这体现了乡村公共精神在重塑,公共规则在重构,即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那么,在当前的“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是如何实现再生产的?是什么深层机理在背后推动着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成功运行?

二、外推与内驱: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所谓的外推与内驱,即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3条线索:行政引导、利益主导与村落记忆。对于乡村公共性再生产而言,前者是外在推力,后两者是内在驱动器。行政引导即政府等公共部门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对村民的利益诉求进行合适、恰当的疏通和引导。利益主导即村民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村落记忆,即村落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传统和记忆,强调归属感和秩序性,对当下人们的价值选择与判断有重要影响。在这3条线索的指引下,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这

也是稀归的“幸福村落”创建得以实施之关键所在。

1. 行政引导:公共性再生产的开路先锋

行政引导,是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的外在推动,如果没有适当的行政引导,公共性的再生产就不能顺利完成,可谓是开路先锋。具体包括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村落理事长的示范与带领以及奖惩机制,在这3个方面的引导下,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得到激发。

(1) 制度设计及其效应。“幸福村落”创建的制度设计对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为村民参与搭建了公共舞台;二是激发了村民的民主意识。

一方面,公共舞台的搭建不仅激发了民主的公共参与欲望,提升了村民对干部的信任度,还可将村庄能人潜在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村(设立“幸福村落”创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农村社区(设立社区理事会)——村落(设村落理事会)——农户的4级组织架构有了新的突破,将治理单元下沉到村落一级,为村民提供了更为可行、更可触摸的参与平台以及表达诉求的渠道,这激发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欲望及激情,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提供了制度性渠道。据某村落的王理事长所言,自从创建“幸福村落”以来,村民对村落长远发展的参与热情与希冀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

“致富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所希望的,谁不想日子过得好点,以前是因为想管想做却苦于没渠道,现在情况好转了,政府还是想着我们群众的,给我们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这一点群众心中是感激的,同时也是非常珍惜的,这从每一次召开村落理事会议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如无特殊情况绝对没有缺席的,在会上群众踊跃发言,为村落的集体发展出谋划策,非常积极。”

这一组织架构清晰地展示了各层级的权力运作,使村民对政府内部运作的认识清晰明了,有利于增强村民对干部的信任度,消除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从王理事长的谈话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政府还是想着我们的”,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真实感言,也是村民对政府信任度提升的真实写照。此外,“幸福村落”是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模式,由于村落规模适度,可以很好地实现责任分配并落实到户,使村民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减少了搭便车现象。

“一长八员”的参与平台使村民能够一展所长,将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使村庄能人潜在能量转化为正能量,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城镇化的推进及高速的人口流动使农民成了经济及社会管理上的双重“自由人”,一些思想糟粕乘虚而入,给乡村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同时,村庄能人缺乏平台,无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个别村民的负影响力如不为体制内吸纳,就可能引导村民情绪的走向,稍有不满意就会鼓动村民围攻村委会,扰乱村庄秩序,破坏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土壤。如果忽视了村庄能人负能量的破坏力,缺乏疏导渠道,则很难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而“一长八员”的制度设置是个很好的疏导渠道。

另一方面,“幸福村落”的制度安排激发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因为由“一长八员”组成的村落理事会是该村落的群众民主推选产生的,不经任何行政力量的掺入,这充分地给予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由与权限,人民当家做主得到很好的落实。对此,某村落调解员王女士很自豪地说道:

“村落的领头人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都对他的领导心服口服,现在可以说村落中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自己做主的事情肯定要自己办,而且还要用心去办好,不能辜负了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

“自己做主的事情肯定要自己办,而且还要用心去办好”,这说明了民主精神内生性地激发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再生,即民主意识对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作出了贡献。

“幸福村落”创建的制度设计不仅为群众的参与公共事务搭建了平台,展示了权力运作,将村庄能人的能量转隐为显。公共责任落实到户减少了搭便车行为,激发了群众的民主意识,这些都内生性地激发了群众的公共精神,即负责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积极投入公共生活,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由公共精神产生公共规则的效应在一定程度规范和约束了村民的行为。

(2) 村落理事长的强感召力。村落理事长作为村落的领导应具备自我奉献精神、为人公道正派,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还要有致富的一技之长,这将使他们在本村落能够更易得到群众的信任与信服。村民才会愿意服从其安排,村落集体行动

才能够一致化,村民自治、公共服务也将能得以及时到位,最终保障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

首先,在村落理事长人格魅力感染下的公共性再生产。人格魅力包括责任感、正义感以及奉献精神。其中奉献精神,即自愿主动扛起致富“带头人”的自觉意识,这是村落理事长应具备的至关重要的素质。村民推选“一长八员”的首要标准是“是否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带领集体共同致富”。诚如某村民所说“能力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奉献精神及对村集体的责任感,因为有的人能够自己致富,但是不愿意分一杯羹,只顾自己的人我们绝对不会选”。村落理事长应对村落的大小事务都充满激情、正义感和责任感,有着奉献及牺牲精神。

X村落理事长在谈到茶叶销售不顺利时伤心落泪;Y村落理事长把自家的一间房腾出来办农家书屋,方便村落百姓看书读报;Q村落理事长成立了村落红白理事会,组建了鼓乐队和宴席炊事队,不仅方便了村落群众,还增加了大家的经济收入。

这是为村民谋福利的真实写照,他们以村落的发展为出发点,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之所以称为“无私”是因为村落理事长都是义务履职,无薪酬,仅得少许物质或精神奖励。因此,村民对其领导心服口服,甚至纷纷效仿其行为,责任意识、团体意识、协作意识等公共精神得到复苏,公共规则也得以发挥效用。

其次,村落理事长领导才能震慑下的公共性再生产。所谓领导才能,一是有魄力,在处理村落公共事务过程中理智且果敢果断,总是精力充沛;二是有策略、有智慧、判断力准确,有一套协调人际关系的高明手段,能够统揽全局、统筹兼顾,倾听不同的意见,秉持谦虚、执着、勇敢的情怀面对村落的大小事务;三是有能力,即村民所说的致富能力,是科技上的“明白人”。他们多为民间艺人、种田能手、烤烟种植户等,他们懂科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能把握住事物背后的规律。在这些村落能人的领导下,村民自然都服服帖帖,形成高效统一的集体行动,相亲相爱和睦发展。

“幸福村落”创建工作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使村落理事长在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落理事长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村民纷纷效仿其行为乃至延续其精神,使村集体的统一行动得以实现,而村落理事长的领导才能更是增强了村民对其

的信服。在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的双管之下,群众工作不再难做;在村落理事长的感化与召唤之下,各村落成功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激发村民的公共参与热情。

(3) 惩罚的约束与激励的诱惑。惩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外在力量推动的公共性再生产。例如,某村落修路之前村落集体签订协议,规定:出资出力的村民可在所修道路上使用大型车辆运载物资,而未出资出力的则不得在此道路上使用大型车辆;责任分配到户,不能按时完成者必须接受惩罚。

村落修路,有一农户既不愿集资也不愿出力,想着“反正修好了你也不能不让我从那过,我坐享其成就好了,何必那么辛苦”。当道路修好以后,他要使用大卡车将所种蔬菜通过村落所修道路大批运到集镇去。但是遭到理事长拦截,理事长指出“依据村落集体签订的协议,你当初并未出一分钱一分力,所以你只能用你的脚使用这条路,而不能用车使用这条路”。该农户无奈之下只能将所缺资金补回来。

此类惩罚关系到受罚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实施制裁的人是共同体的成员而非外部权威,这是惩罚机制得以运转起来的关键。在上述访谈中,村民不愿参与修路的代价是不得在此路上使用车辆运载货物,而该村落坐落于大山沟,所种植的农产品,如果不能及时运出销售,将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农户不得不补全所拖欠的修路集资款。

此外,激励机制也能再生产乡村公共性。如“五星”家庭评比活动激励村民保护环境,保持村落整洁;而村集体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对全年各类先进典型的表彰更是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如X村每年都要举办全体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在向村民报告工作的同时,重点表彰全年各类先进典型,“3+1”文明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优秀共产党员、“三好”外出务工人员、身残志坚先进个人等15类受表彰对象纷纷走上红地毯,接受物质嘉奖或精神奖励。产业大户宋某说“在村里当先进有名也有利,体面又实惠,大家都比着争着发家致富”。因此,人人争当先进、家家不甘落后,全村上下发展劲头足,村风民风好。

2. 利益主导:公共性再生产的核心源动力

利益主导,是乡村公共性再生产重要源泉及核心推动力,它包括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两方面。公共利益是村落共同体内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公共需求指村落共同体的共同需要,而非村落个别需求简单累加的总和。如果某项政策不符合村民的利益与需求,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其推行也必将受到诸多阻挠而难以实施。因此,政策设计一定要契合村民的切身利益与需求,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1) 公共利益的内聚作用。人类行为及选择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也与其利益有关^[10]。列宁也指出,群众选择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11]。

促使人们作为或不作为的重要动机就是利益。公共利益对于集体行动的形成、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有着不言而喻的助推作用。如共同致富是村集体的公共利益,也是村民实现长远发展的渴望,这是修路等公益事业得以顺利完成的至关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平坦宽敞的道路,不但会增加运输成本,也难以吸引批发商进村大批采购柑橘等农作物,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增收。如果要谋划村庄的长远发展,则必须合作起来建设村庄公益事业,如B村的柑橘因道路难走就只能以贱价(0.10~0.15元/kg)卖出,被中介商赚取巨大差价而无能为力。

“单户根本不成气候,风险非常大,首先成本就吃不消,即使拉出去了也没有销售门路,会赔本赔死的。所以我们村现在也有成立农民合作协会的设想,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也一直在搞品种改良,尝试种一些反季节、多品种的柑橘。因为柑橘一般都是秋冬成熟,那时候天气冷人们不大愿意吃这么凉的水果,很难销售,卖得那么贱农民也心疼啊!所以有人就自发地琢磨改良的事儿,只要政府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技术培训,他们是非常愿意配合的,因为农民自个儿也有发展的意识和改良的欲望”。

(2) 公共需求的内聚作用。秭归县是一个特殊的山区县,山大人稀,一个行政村所管辖的平均面积可达10 km²以上,平均人口约为1700人,面积在20 km²以上的村有22个,有些村的最高海拔达1000 m以上。近年来村庄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

增多,留守村内的均为老弱病残幼,而村“两委”干部只有3~5人。因此,新时期下的村庄治理出现种种困境,乡村服务与管理较之以往更为艰难,导致农村政策宣传、矛盾化解、困难帮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而在创建“幸福村落”后,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如低保户杨某去世之后,因其女儿长期在外无法取得联系,且家中一贫如洗,后事难以料理。在“一长八员”的积极张罗和动员下,村落内的群众齐心协力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才使杨某得以顺利安葬。显然,地理环境的阻隔迫切需要集体的团结,特殊的地理环境急需在村落内形成“一人有难众人帮”的格局,如此村民的困难才得以及时化解。

3. 村落记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孕育基础

村落记忆是对村落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和记忆,类似于共同体意识或归属感,突出表现在村落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以及村民行为的秩序性。具体表现形式为:村落的历史与传说、村规民约、宗族或宗教等活动或仪式以及其他象征体系,它记录并保存村落历史,影响当下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12]。村落记忆是生产乡村公共性的重要机制之一。如仝志辉所言:记忆清晰的村落往往内聚力强,乡村公共精神也丰富,而记忆淡薄的村落则内聚力不强,人们各行其是,缺乏公共精神^[13]。而村落正是一个拥有共同的、由历史积淀形成的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乡村基本单元,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传承着大量村落记忆。

王理事长提到到村庄中人们的情感现状时欣慰地说道:“群众之间的感情还不错,虽说偶尔有点小摩擦,但不影响相互之间的感情,谁家遇到困难了其他几家肯定是立马施援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老祖宗的时候就是邻居了,都是一起避难来到这儿的,左邻右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吵两句还热闹闹的。大打出手可就是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了,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所以,这也使得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时候非常省力,大家都听劝。”

“老祖宗的时候就是邻居了”,这说明历史的积淀巩固和加深了村民之间的感情基础,所以对于相互间矛盾都会有所忍让,王理事长也才会有“做群众工作的时候非常省力”的感言。正是因为这点,

村落集体行动的形成才得以可能。正如仝志辉的论断:社区记忆浓厚,村庄的内聚力或归属感强,村规民约等传统有着强规约性^[13]。村落的内聚力、归属性和规约性强,意味着培育乡村公共性的土壤相当完备。因此,村落记忆是实现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

三、结论与讨论

公共性是一种团结和谐的氛围,是一种互助友爱的精神,也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社会新进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基础逐渐被淘汰或被取代,传统的乡村公共性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基础被破坏,传统的乡村公共性逐渐趋于瓦解与流失,人际关系变得待价而沽,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弥漫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村庄治理困境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村庄的良好及有序发展。所以,重建乡村公共性是当前村庄治理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工程为重建乡村公共性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榜样,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结和创建模式。首先,秭归县在行政引导上,包括制度的设计、组织架构的安排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有所创新和突破;与此同时,更注重挖掘民众的内生性需求,使行政安排契合于民众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以使其变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驱动器;最后,还充分发掘了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

关于“幸福村落”创建的一系列行政举措,包括制度设计、村落理事长的设置以及奖惩措施的安排,有助于激发群众的公共精神,并产生公共规则效应,不仅为群众的公共参与搭建了平台,并激发其参与的意愿,而且还增强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将村庄能人潜在的能量转化为现实的正能量,使村民积极主动且负责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一定程度上还对村民的失范行为起着规范与约束的作用。村落理事长的人格魅力感染和领导才能使得各村落成功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奖惩机制也是再生产乡村公共性的一种诱发机制。

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仅有完善的行政举措是不够的,还要使行政举措与村民的切身利益与

需求挂钩。因为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是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及核心推动力。政策设计就一定要契合村民的切身利益与需求,如此才能很好地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此外,还要充分发掘村落记忆的作用。因为村落记忆清晰,意味着这一村落的内聚力甚强,村民对村集体的归属感也强,而且有助于实现乡村公共精神的再次繁荣,也意味着村规民约等传统有着强规约性。因此,要充分发掘村落遗留下来的共同的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和亲情文化。

总而言之,完善的行政举措和制度设置必须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和公共需求实现很好的对接,此外还要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这才是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的根本逻辑和内在根源。

致谢: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导师吴理财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参 考 文 献

- [1]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
- [2] [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C].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9.
- [3] [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2-121.
- [4] 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 [5]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43-261.
- [6] 吴理财.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J].人民论坛,2012(4):64-65.
- [7] 张胜前.转型期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与再造[J].商业时代,2012(27):21-22.
- [8] 赵晓峰.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J].学术界,2012(6):232-236.
- [9] 湖北省民政厅联合调研组.探索社区建设好模式——以秭归“幸福村落”建设为例[J].学习月刊,2013(10):48-51.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537.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572.
- [12] 吴理财.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23-128.
- [13] 全志辉.“社区记忆”[EB/OL].(2013-03-23)[2013-06-23].http://blog.china.com.cn/tongzhihui/art/3315719.html.

Internal Logic of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in “Happy Village” Construction

YANG Yu-zhen

(Center of China Rural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Innov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Based on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visits, survey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appy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Zigui county, Hubei province and finds that this construction project can not only bring hopes for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but also 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 activat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flourish public culture and purify rural atmosphere. In view of the degrad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ommon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production of rural common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y village” from administrative measure, benefit effects and village mem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nternal root of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depends on good connection between perfec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masses’ immediate demands and adds the adhesive function of village memory.

Key words “Happy Village”;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culture; villag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责任编辑:张艳)